# 墨之源流

王俪阁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古墨、古钱币。

迄今为止，中国墨发端于何时何地尚无定论。古代文献有很多与墨相关的记载，但多为使用的情况，没涉及到当时墨的材质、形态。如《尚书》卷四记载：「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刑墨即鲸面——在人的面额上刺刻后染墨，使痕迹终身不褪。陈祥道《礼书》卷七十三：「卜人定龟，史定墨。」「史定墨」是古代巫人的一种占卜方法——先用墨画在龟甲上，然后灼烧，根据裂纹定凶吉。《庄子》中也有墨的记载：「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笔和墨，在外者半。」对商代甲骨文颜料的微量化学分析结果表明，其黑色是碳素单质即现在墨的原料，对河南安阳殷墟的考古遗物进行测试也发现，当时的人们用一种与现代墨相近的黑色碳离子混合物为书写颜料，考古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竹简上的文字也是用笔蘸墨书写的。文献记载与出土发现证明，至迟三千年前，墨就产生了。

先秦时期是中国墨的形成时期，其时的文献虽然有关于墨的记载，但多为使用的情况，没涉及到当时墨的材质、形态。按「墨」字的组成从土从黑，而「黑」的本字是「黑」，从炎，上出「囧」，「囧」与囱同，象征灶突。因而从「墨」字的构成说，它是一种经过燃烧形成的黑色土。东汉刘熙《释名》：「墨，晦也，似物晦黑也。」许慎《说文解字》：「墨，从土、黑也。」这都说明墨是「烟煤所成土之类」（朱长文《墨池编》卷一）。这些记载都是对早期墨的诠释。从文献和间接的与墨有关系的实物推测，早期的墨可能是松树和其他多油的树木作烟料制作的粉状物，使用时加水调和，由于没有考古实物证实，先秦人造墨究竟是以什么形态存在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墨的发展时期。考古发掘发现，秦汉时以松烟为原料的人造墨技术初具雏形。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四号战国秦墓出土了一锭秦墨，此墨类似丸形，直径二点一厘米，长一点二厘米，色纯黑，但颗粒粗糙，具一定的原始性。同时出土的，还有竹木简牍和一方石砚，砚上放一块研石，砚面残留有墨痕。睡虎地秦墨的发现，证明了至迟到秦代已经出现了制成固定形状的墨丸。同一年，湖北江陵楚故都纪南城内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也出土了西汉墨，墨风化严重，碎成几块，但色泽纯黑，质地较前面提到的秦墨细腻。据同墓出土竹简记载，此墓主人葬于西汉文帝十三年（前一六七年），可见此墨制作时间至迟不会晚于此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中也出土了数以千计的墨粒，同时也有石砚和砚杵出土。此外，考古发掘出土的汉代长方形漆砚盒和带有浮雕装饰的砚台上，也都留有砚杵放置的空间。这说明秦及西汉时期的人工




**清乾隆　兰亭修禊白御墨**
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兰亭修禊绿御墨**
故宫博物院藏

墨形态较小，使用时，将墨放在砚石上加水后，再用砚杵压住捻和。东汉时，不但体积稍大的墨出现，还出现了模制墨，如河南陕县刘家渠东汉墓出土的松烟墨，是用墨模压制成锭的，墨质坚实，外皮有皱纹。一九七四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周原县西郊出土的东汉松塔形墨，高六点二厘米，直径三厘米，形如松塔，墨烟细胶清，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墨模的出现，在中国制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自此以后，墨的制作有了定式，虽然不同时期制墨工艺有所不同，但以模制墨的基本技术一直沿袭下来。结合「尚书郎起草，月赐隃麋大墨一枚、隃麋小墨一」（顾起元《说略》卷二十二），「皇太子初拜，给香墨四丸」（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一）等史料的记载可以推测，墨在东汉已经有了相当高的水平，有形制、大小、品种和产地的区别，以「枚」、「丸」相记，而且「香墨」应该是已经加入香料或其他配料制成的墨。另外，也出现专供朝廷等政府机构使用的墨。

汉代烟料基本取自陕西，扶风（今凤翔）、隃麋（今千阳）、终南山之松所烧烟尤佳，制成的墨中以隃麋松烟墨最优，名重一时。相关文献资料表明，汉代制墨集

中在陕西地区，虽然分布零散，已经初具规模，出现了名留后世的制墨家田真。由于缺乏汉墨制作的记载，汉墨的具体原料配方已经不得而知。但此后相关的制墨方法及名墨家所制墨的特点散见于诸多史料文献中。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墨的制造走向成熟，墨产地进一步扩大。南方九江、庐山之松烧烟所制墨成为新宠，《墨薮》「取墨必庐山之松烟，岱郡之鹿角胶」；书法家卫夫人《笔阵图》「墨取庐山松烟」之论，都说明了庐山松烟墨的得势。当时已经有石墨、松烟墨等不同原料制造的墨。此间制墨家在汉代烧松取烟制墨的基础上不断摸索创新，改进制造工艺和配料，尝试将各种珍贵原料掺合于墨中。如晁贯之《墨经》记载，三国时期魏国韦诞（仲将）制墨是用珍珠一两、麝香半两捣细后，合烟料下铁臼中捣三万杵。北魏贾思勰制墨含有珍珠、麝香、楛木、鸡白。《冀公墨法》记载冀公制墨时，用「松烟二两，丁香、麝香、干漆各少许，以胶水搜作挺（墨锭），烟火上熏之一夜」，再「入紫草末」或「秦皮末」。名家名墨开始有品牌效应，韦诞墨的「一点如漆」，刘宋张永墨的「色如点漆」都为当代及后世津津乐道。见诸文献记载的制墨家及其制墨逸事多起来，说明制墨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在制墨艺人们的努力下，墨的质量进一步提高，三国孙吴前期高荣墓出土的圆柱形墨，径三点五厘米，长九点五厘米。东晋吴应墓出土的不规则形墨，宽四到六厘米，长十二点三厘米。江苏镇江丹徒县出土的六朝时椭圆柱形松烟墨，残长三厘米，宽四点二厘米，厚一点九厘米，纯黑如漆等都证明，此时普遍采用以模制墨工艺，墨的体积较秦汉明显增大，墨表留有明显的模印痕，如高荣墓的墨上有叶脉纹、梁孜墓的墨有几何纹。值得注意的是此间少有砚与研石相伴出土，砚盒或砚台没有、也不预留放研石的空间，而多增加了墨池的设计。从砚型的变化可推测，这一时期的墨已可直接在砚上沾水研磨成墨汁使用了。

除了陕西陇麋、江西庐山等以制墨闻名外，河北易州（今河北易县）生产的墨在这一时期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北方墨的代表，北朝易州制墨世家奚氏家族的出现，不但为当时北方墨业注入新鲜活力，也为后来的徽墨奠定了基础。

隋唐之时，经济文化的发展、书法艺术的昌盛、朝廷的重视等多种因素作用，






**清康熙　星聚万年枝墨**
故宫博物院藏




**明宣德　龙香御墨**
长八·六厘米　宽二·九厘米　厚〇·九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极大地促进了制墨业的发展，制墨业呈现一派繁荣之势。见诸记载的著名墨工多了起来，如祖敏、奚鼐、奚鼎、奚超、陈朗、王君得、黄秉云等，其中又数对名墨家祖敏及其制墨的记载最为详细：「（祖敏）本易定人，唐时之墨官也，故以『济土』为号……造墨必以鹿角胶煎为膏而和之，故祖氏之名闻于天下，今墨之上必假其姓而号之，大约易水者上。」（苏易简《文房四谱》卷五）关于唐墨的记载也逐渐详细起来。如宋人何薳《春渚纪闻》卷八「墨说」记载，王景源收藏一锭古墨，可能承继于其先祖父待制公，墨的背面铭「唐水部员外郎李惜制」。他还曾经在「内省任道源家见数种古墨」，「有唐高宗时镇库墨一笏，重二斤许，质坚如玉石，铭曰『永徽二年镇库墨』而不著墨工名氏」。《新唐书·艺文志》记载，玄宗修图书，创集贤院大府，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元代陆友《墨史》记载，著名书法家李阳冰制作的一锭供御墨，「巨挺，其制如碑，高逾尺而厚二寸，面蹙犀文，坚润如玉，有篆款曰：『文华阁』，中穴一窍，下画泰卦于麒麟之上，幕篆六字曰：『翠霞日臣李阳冰』，左行书『大历二年二月造』」（陆友《墨史》卷上）。



**清　曹素功款青麟髓漱金舌式墨**

高六·九厘米　宽二·六厘米　厚一·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明代王路《花史左编》记载唐玄宗李隆基「以芙蓉花汁调香粉作御墨」。

文献记载外，也有唐墨出土。一九七八年安徽祁门北宋墓出土的唐代「大府墨」，近似长方形，残长八点三厘米、宽二点七厘米、厚一厘米、重十八点二克。上端残缺，中断，下端有磨损。正面题识「大府」，楷书，阳文，系墨成形后再压刻而成。背面残留「制」字。按《新唐书·艺文志》载：「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而即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今河北易水）墨三百三十六丸。」太府即大府。「大府」墨是现存最早的有明确题识的墨，「大府」之铭标识了墨的使用对象范围，后来出土的元代「中书省」墨、文献记载的宋代「德寿宫」、「淳化轩」、「乐寿堂」等题识墨，可能都发端于此。一九七二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县唐墓出土的唐代松烟墨，椭圆形，长十一点四厘米、宽三点一厘米、厚一点四厘米。墨锭正中白地上有楷书铭文「松心针」三字。

除文献记载及出土所见外，尚有传世唐墨数锭，几乎都收藏在日本正仓院，最




**清康熙　吴生琴式墨**
长八·六厘米　宽一·九厘米　厚〇·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为珍贵的是有一锭墨上有「开元四年」纪年。

前述种种说明，唐代制墨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墨体积大，已经出现了在墨上铭刻制墨者名款、制墨年代、墨的用途等事例，如前述水部员外郎李惜制墨、李阳冰制供御墨和唐朝镇库墨都是很好的例子。还有了在墨的表面刻绘装饰图案、给墨品题名等情况，如墨务官祖敏制造的墨上就有他的题识；李惜制墨既有墨品名「宝墨」，也有「水部员外郎李惜造」题识。墨有了更多种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御墨。而且随着制墨业的发展，墨被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有了很多称谓，「元光」、「青松子」、「松滋侯」都成了墨的雅号或戏称。以后墨的称呼更多，包括因为墨为黑色而造型似玉圭者被称作「玄圭」，还有「乌金」、「龙宾」、「龙香剂」、「黑松使者」、「松烟都护」、「玄香太守」、「燕正言」、「体玄逸客」等称谓。除此之外，墨还有「爵号」，据唐人冯贽《云仙杂记·墨封九锡》：「薛稷又为墨封九锡，拜松烟都护、玄香太守、兼毫州诸郡平章事。」

在不断的发展改进中，文人墨家对墨的理解已经不单纯是实用品，还是寓情之物。

**明万历　方于鲁文犀照水髹彩墨及款识**

径一二·七厘米　厚一·六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明万历　方于鲁文彩双鸳鸯泥金髹彩圆墨及款识**

径九・五五厘米　厚一・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易州、潞州、上党的松烟墨占据了墨业主流，「上党松心尤先见贵」（晁贯之《墨经》）。北方中原地区制造的墨不但是御用品，还供应广大的墨品市场，占据着唐墨的主导地位。

唐末五代战乱频繁，社会动荡，北方百姓为躲避战乱纷纷南迁。在这样的背景下，易水制墨名家奚超也携子渡江迁居歙州。奚氏南迁后重操旧业，改进了制墨方法。他们采用优质的宣州、黄山、歙州、黔山、松罗山所产优质松烧烟作原料，搭配珍珠、玉屑、龙脑等材料，并和以生漆捣十万杵，所制出的松烟墨明显优于旧时，很快得到当地人的认同，受到朝野上下的广泛欢迎。奚氏制墨进献南唐，得到后主李煜赏识，赐奚超以国姓「李」，又昭其孙李惟庆为墨务官，专门制墨供御用，由是以北方溪氏墨为基础生产的李墨才在江南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由于奚氏制墨需求量大而产量低，而且处于不断探索中，墨的质量有时也不稳定，据记载，刺史陶雅曾经抱怨李超的墨不如以往细致坚硬，李超感叹地答道：「公初临郡，岁取不过墨十挺，今数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明代张丑（谦德）《论墨》也认为，李超之子李廷珪不同时期所制墨的质量有所差别：落款时「李廷珪」的「珪」字写作「邽」的墨最好，写作「圭」的次之，写作「珪」的再次之，写作「奚廷珪」的最下，而写作「庭珪」的则为伪作，墨也不精。由于今天已经鲜有李廷珪所制墨传世，张氏所云是否正确没有办法印证。不过张氏能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作出这样的结论，也说明了明代人对墨的记载不再局限于就事论事了。

由李超开辟的歙州制墨业至其子廷珪时，始集大成。在朝廷的支持和李氏的带动下，南唐制墨业蓬勃发展起来。相应的，名留后世的墨家为数众多，不仅墨家的姓名，墨家的典型墨品也见诸著录。从文献记载可以查到的五代十国墨家和墨品远多于以往各代，这其中包括：李超、李廷珪（超子）、李廷宽（超子）、李承宴、李文用（承宴子）、李惜、李惟庆、李惟一、李仲宣、耿遂仁、耿文政、耿文用、耿德、耿盛、盛匡道、盛通、盛真、盛丹、盛信、盛浩、朱逢、景焕、韩熙载、徐铉、徐熙、徐崇嗣（徐熙子）等。子承父业、同宗共持是当时制墨业的一个显著特点。

文献记载中，还有一种非专业制墨家制作的墨，如出自韩熙载之手的面「化松堂墨」、背「玄中子」墨，出自徐铉之手的「月团」墨等。可见当时不但制墨者、文人墨客也以自制墨为耀。

文献记载外，二〇〇一年还在扬州市南唐吕德柔墓出土一锭落款为「丁远」的五代时期松烟墨，此墨为不规则长方形，模压制成，残长十一点五厘米，宽五厘米，厚一厘米，正面阴文楷书「供使远烟细墨」、背面方框内阳文「丁远墨」，墨质细胶凝，光泽依旧。

前述列举的记载、实物说明，五代制墨已采用很成熟的墨模模印工艺，墨的形状富于变化，圆形，圭形、树叶形、椭圆形均已经出现，墨面、背的装饰形式也有了一定的规律，或正面铭文、背绘刻图，或双面铭文，但这时的铭文基本标示墨的性质，只有少数有像韩熙载「麝香月」、「玄中子」一类的称呼，制墨者无一例外将自己的名字标识在墨上。将制墨者姓氏标于墨上，一方面体现了制墨家对产品的保证与自信，另一方面体现了墨的名牌效应。

五代十国时，制墨重心移到南方，主要产地是皖南歙州，这一变化奠定了宋代

以至元明清徽州制墨的基础。

宋代制墨业空前繁荣与发展，成为中国制墨史上一个高峰，这体现在制墨地区广泛，制墨原料增多，不断有新产品问世，墨的质量提高，名家辈出，新墨品纷纷出现等，大体情况如下：

墨业兴盛，宋代制墨家见诸史载的有近百人之多，其中不少是名垂青史、为中国制墨做出贡献的杰出墨家，如名工张遇于熙丰年间成功地制造出油烟墨，他用桐油烧烟作原料，加入龙脑、麝香、金箔制作的供皇帝使用的墨，称为「龙香剂」，后世墨家不乏以「龙香剂」为墨品名者，可见张氏此墨影响力之大。以桐油烧烟是中国墨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种制墨原料的使用，不但丰富了墨的品种，为后代墨家沿用，而且由于油烟墨的特征与松烟迥异，也为书画家创作不同艺术品时根据实际需要提供了新的选择。张遇将徽墨由单纯的松烟墨，推向了与油烟墨并举发展的新时期，自张遇开始，不断有人探索并成功运用油烟制墨。宋人李孝美《墨谱》记载了多种制油烟墨的方法，如以桐油为原料烧烟，填加秦皮、巴豆、栀子仁、甘松、藿香、陵零等配料；以清油、麻子油、沥青作原料烧烟，以酸石榴皮、胡桃青皮、皂角等为配料；以麻子油为原料，紫草、巴豆、秦皮等为配料；以麻子油、沥青为原料，酸石榴皮、牛角眙、草乌头、紫草、巴豆等为配料；以大麻子油、糯米为原料，皂角、龙脑、麝香、秦皮等为配料……不同原料加不同配料都是为了使所制墨质量更好。从李氏列举的配料可以看出，其多为中药，它们在制墨中所起作用不同：秦皮可以解胶，陵零、藿香、丁香、龙脑、麝香等可以中和烟煤与胶的异味；栀子仁可以去胶色等……李孝美能列出这些油烟墨的制法，一方面说明他对制造墨有研究，一方面也说明了当时油烟墨的兴盛，制墨家对制墨所用原料配方、制墨方法的开放态度。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家庭手工业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不外传，因此而导致很多优秀手工业技术失传，后世对诸多事物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生产还要重新摸索探求。制墨可以说是个例外，历代名家的制法不同程度流传下来，为后人制墨提供了经验。这也应该是中国制墨水平持续提高的原因之一。进入明以后，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竞争激烈，制墨方法不再开放，各家制墨的配方成为秘密，时至今日，徽墨的产地还保留着这一传统。因油烟墨的发明与烧制，减少了对古松的需求，在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保护生态，同时也拓宽了制墨原料的来源渠道，开辟了制墨业的新领域，油烟墨逐渐取代松烟成为徽墨的主要原料。北宋大观年间，墨工高庆和尝试以松枝蘸漆烧烟，发明了漆烟墨。制墨家潘谷于元祐时名噪一时，被称为「墨仙」，他制作的「松丸」、「狻猊」等墨，「遇湿不败」，「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衰」，被誉为「墨中神品」，倍受青睐。吴滋所造之墨「滓不留砚」，曾得宋孝宗犒赏缗钱两万的奖励；柴珣采用二李胶法制作的墨形式多样，其中铭文「柴珣东窑」的墨，深受士大夫喜爱，将之与金玉并论。九华朱觐还成功地制出用胶作软剂的出光墨……陆友《墨史》记载：「朱觐，九华人，擅用胶做软剂出光墨，滕元发作郡日，令其手制，铭曰『爱山堂造』者最佳，子聪不逮其父。」关于朱觐软剂出光墨现有实物面世，一九八八年一月安徽省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在合肥市郊宋马绍庭夫妇墓出土了一锭朱觐制墨，此墨为松烟墨，梭形，长二十一厘米，宽三点四厘米，厚零点七厘米，脱水后干重三十九点二

克，一面阳文楷书「九华朱觐墨」，一面椭圆形线框外模印二「香」字，内印凤纹。苏浩然所制墨均「松纹皴皮，而坚硬如玉石」，高丽人入贡时专门提出要苏墨。戴彦衡、吴滋、叶邦宪、沈珪、叶实茂等名家在选料、配方、烧制、和胶及捣杵等工艺方面也分别有所创新，为后世制墨积累了经验。在前面提到的合肥市郊宋马绍庭夫妇墓中，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一锭「歙州黄山张谷制」墨，此墨亦松烟墨，梭形，长二十五厘米，宽五厘米，厚一点四厘米，脱水后一百零九点六克，一面长方线框内残存模印「歙州黄山张谷□□□□」铭文，后有专家考证，张谷后面的四字应是「男处厚墨」，据元陆友《墨史》记载，张谷是宋代名墨家张遇之子，处厚是张谷之子。一九七七年江苏省武进县出土南宋叶茂实墨，长方形，残长五点五厘米，宽二点三厘米，厚零点六厘米，重十四点五克，一面残存「玉」字，一面残存「实制」。叶茂实以擅制油烟墨而闻名。这些珍贵的实物与文献相互佐证，说明宋代墨家制墨名不虚传。

宋代文人墨客参与制墨成为时尚。以往时代也有文人士大夫参与制墨，如前面提到的五代韩熙载、徐铉、徐熙等，他们更多的是参与墨的制造。宋代文人墨客也喜欢制墨，如苏东坡曾经得烟造墨，并题识曰「南海松煤」、「东坡法墨」，秦少游、黄庭坚、陆游甚至宋徽宗也都曾经亲自制造墨，据记载，徽宗所制的苏合油墨深为后世青睐，到金章宗时，即使高价索求也得不到了。不仅如此，宋代文人墨客还喜欢品墨，何薳《春渚纪闻》记载，有人请苏东坡评判从李廷珪到潘谷十三位墨家制墨的好坏，东坡就用这些墨分别写首诗，每篇后面写上墨工姓名，按照好坏进行排列。

宋代出现了有迹可查的贡墨制度，有铭以贡墨的实物，据记载：朱君德、柴成务、李文远皆易水人，「其制有剑脊、圆饼、拙墨、进贡墨、供堂墨，其面多为龙纹，其幕（音漫）有『宣府』字，或止云『宣』，或著姓氏，或别州府。今人间已少有传者」（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一九九五年江苏宝应宋墓出土的一锭桐油烟墨，椭圆形，长十四点九厘米，宽三点九厘米，厚一厘米，重四十克，墨正面作双线长方框，内楷书「东山贡墨」四字，表有漱金痕迹，制作得极为精细，这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贡墨实物之一。从墨的款识上还可以看出宫廷用墨的特点——将墨的使用范围标出来。如叶世英造的「德寿宫」墨，徐知常、叶邦宪造的「复古殿」墨，「雪斋宝」墨，「缉熙殿」墨等。而复古、缉熙、德寿等殿堂均为宋代皇宫后寝的宫殿名。清朝内务府制墨标明其所属收藏使用地如颐和轩等，可能就是受了宋墨的影响。

墨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成果显著。宋徽宗对文物的偏好，带动了民间的收藏研究热，「士大夫之好事者蓄图画书刻器用之类，必皆以传之久者为贵，书画至于漫蚀而不完，器用至于诡怪而难辨，则宝而藏之愈」（李孝美《墨谱法式》）。古往今来一切与艺术文化相关的东西都成为人们追逐研究的对象，一向为文人墨客案头物的墨也不例外，随着制墨业的蓬勃发展，上自皇帝下到平民百姓不乏嗜墨之人。随之而来，关于墨的记载、研究著作多了起来，出现了研究墨的专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有了关于制墨的专著——《墨谱法式》。《墨谱法式》，宋代李孝美著，为今存最早的论墨之作，分三卷，上卷用图示加文字说明的方法，详细叙述了制墨从采松开始直到制成墨的全过程；中卷以绘图形式




**清康熙　曹素功紫玉墨之桃源洞天墨**

长五・九厘米　宽二・二厘米　厚〇・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记录了从唐代墨官祖敏的「济土」到宣道、宣德二人制墨，并记录了包括猛州贡墨在内的三锭新罗（今朝鲜）流入中国的墨；下卷记叙不同时代墨家制墨的原料、配方和制墨方法。《墨谱法式》对后世制墨具有重大影响。除李氏外，较有影响的书籍还有，何薳的《春渚纪闻・墨说》，专门记述唐宋间墨坛掌故，并对古代的制墨方法如和胶、选烟等加以简略论述。晁贯之的《墨经》，记述从选料到成品及制墨的最佳时间、如何辨别墨品好坏。苏易简的《文房四谱・墨谱》，记述自汉至宋间墨的历史沿革，制造、逸闻趣事等。

制墨地区广泛，宋代制墨地点广布全国。从官方的史籍记载看，除了潞州、易州、绛州仍沿唐故、继续贡墨外，安徽的歙州、山东的鲁郡所制墨也成了贡墨选择对象。四川、浙江、海南制墨也散见于宋人笔记诗文中。

宋代制墨发达。除了松烟墨外，油烟墨、松油烟墨都已经发展起来，且油烟墨的制造已经达到很成熟的地步。全国最大的制墨基地仍为歙州，每年进贡龙凤墨千斤。除了歙州，其他地区也有在制墨方面不断创新的人物，何薳《春渚纪闻》记

载：「漳州胡景纯专取桐油烧烟，名桐花烟，其质甚坚、薄，大者数寸，小者圆如钱。」可见当时探索新方法制墨的，不仅是徽州墨工。陆友《墨史》也记载，宋代「长沙多墨工」。特别是在北宋诸多制墨家的共同努力下，徽州的制墨步入了大发展的鼎盛时期。北宋宣和三年（一一二一年），朝廷改「新安」为「徽州」后，「徽墨」这一称谓随之出现，相沿至今。

元代制墨基本承传宋代。著名的制墨工匠有十余人，潘云谷、胡文忠、林松泉、于村仲、杜清碧、卫学古、黄修之、朱万初、邱可行、邱世英、邱南杰。其中朱万初所制墨最为有名，他所制墨「纯用松烟，盖取三百年摧朽之余精英不可泯者」（蒋一葵《绕山堂外纪》卷七十三）。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五八年山西大同冯道真墓出土的一锭元代「中书省」墨，此墨椭圆形，模压而成，形体基本完整，一面为龙戏珠纹饰，图案与雕刻艺术与宋代风格同，一面阳文篆书「中书省」三字。因长期在地下受潮气侵蚀，已经断裂。这一出土实物，填补了元代墨的空白。

元代也有关于墨的著作，主要是张寿的《畴斋墨谱》，首列李廷珪等所制墨三




**明　程君房制寥天一墨**

长八・九厘米　宽二・四厘米　厚〇・九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十一品，并有试墨序文及宋代墨工蒲大懿的简介。陆友的《墨史》，收集了一百三十多位历代制墨名家的事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墨家均为宋及以前人，没有元朝墨家，也鲜有元朝制墨情况的载录，从一方面反映出元代制墨业的不景气。

明代制墨主要集中于安徽地区。与其他传统手工业一样，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刺激，制墨行业也出现了剧烈竞争。而随着徽州商业的繁荣，徽商的辛勤努力，徽州制墨家的广泛宣传，徽墨声名远扬，产品传遍全国，并行销海外。其时制墨业人才济济，名工辈出。据明末麻三衡《墨志》记载，明代徽州地区墨工已达一百二十余人。嘉靖年间的方正、邵格之、罗小华以及万历中期的程君房、方于鲁、汪春元、叶玄卿等，都是在激烈竞争中相继兴起、独领风骚的代表人物。「松烟」墨继续制造，「油烟」、「漆烟」也被广泛采用，制墨行业形成百家争艳的局面。明墨不仅质量精良，而墨谱的图式、墨模的雕刻等，也各尽其美，就连装墨的漆盒也非常精致，富有装饰性的成套墨——集锦墨开始出现。制墨业再创新高。

此时关于墨的著作更多，有关于墨的制造的，关于墨的历史沿革的，逸闻趣事及墨的收藏的，制墨图谱等。如：沈继孙的《墨法集要》，张谦德的《论墨》，项元汴的《墨录》，麻三衡的《墨志》，潘膺祉的《如韦馆墨评》，陶望龄的《墨杂说》，程君房的《程氏墨苑》，方于鲁的《方氏墨谱》，方瑞生的《墨海》等。这些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清代制墨有两大主线：地方和中央。地方制墨仍然集中在徽州，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徽墨亦经历了胜极而衰的变化，早、中期，仍是制墨业的鼎盛期，在明的基础上，徽墨制作家们推陈出新，各领风骚。著名的曹素功、汪近圣、汪节庵、胡开文制墨四大家制墨贯穿了有清一代。中央则在内务府设「内务府墨作」。清朝廷极重视制墨，不但在内务府设「墨作」制墨，还专门从产墨的徽州选名家进京指导，汪近圣之子汪惟高就曾经在内务府呆了三年指导制墨，贡墨、御墨是清代最具特色墨。

清代制墨是在明的基础上完善和多元化的，此间文人自制墨大行其道，参与制墨的人数、墨的品种都创造了历史之最，反映了文人自娱的一种价值趋向。清代制墨行业在道光之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清代末年，由于受到墨汁发明、海禁大开、洋烟涌入等的冲击，传统制墨业遭受重创，从此一蹶不振。

与明一样，清代关于墨的著作也很多，大致有：《内务府墨作则例》、谢蒨岱《南学制墨剳记》、万寿祺《墨表》、张仁熙《雪堂墨品》、宋荦《漫堂墨品》及《漫堂续墨品》、曹素功《曹氏墨林》及《徽歙艺粟斋墨品》、汪近圣《鉴古斋墨品》、孙炯《砚山斋墨谱》、汪炽甫《纪墨小言》、邱学敏《百十二家墨录》、徐康《窳叟墨录》、姜绍书《墨考》、借轩居士《借轩墨存》等。

与其他手工业不同的是，墨作为书写绘画的必需品，从形成时起就再没有中断过，由于行业的特殊性，不同时代的墨家均喜欢将自己的名字题在墨上，以示对所制墨的质量保证，文人墨客也附庸风雅，自己题识请墨家制墨。这种无意间留下的史料，是其他行业无可比拟的。



**明　罗小华制半核桃式墨**

长四・七厘米　宽三・一厘米　重一一・五克

故宫博物院藏